

第二章、韓國與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的背景與發展

第一節、韓中關係改變之因素

一、八十年代國際環境的改變

一) 意識形態之淡化

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上台之後，在蘇聯社會主義所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危機認知而提出「重建」和「開放」政策，使得東歐關係上出現真正結束冷戰的轉機。¹

在美國方面也構思新對外政策，其原因：第一、國防能力雖有改善，但是軍事支出龐大令人吃驚，而欲達到對凌駕於蘇聯的軍事優勢仍很困難；第二、美國在中東、中美洲等地區面臨很多問題；第三、西歐盟國希望美蘇和解，歐美民間反核運動不斷擴展；第四、蘇聯經濟雖因軍備競賽受到不利影響，但並未出現重大危機等原因。²所以，美國也有感覺到重新謀求和解的必要性。

美國和蘇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雷根與戈巴契夫在日內瓦舉行高峰會議後，從此兩國關係逐漸緩和，走向新關係之途。兩國關係的變化，對於全球範圍之內的各地區的冷戰架構的變化，有了直接的影響，終究導致蘇聯和東歐共黨政權的崩潰，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形成的國際秩序完全改觀。這種國際環境的變化，對於代表東北亞冷戰的韓半島有正面的影響，包括南北韓關係、南韓和中國大陸關係、中國大陸和台灣之兩岸關係上都出現新的局勢。

二) 追求經濟發展

然後，國際體系的另一個特質就是追求經濟發展。除了國家主權獨立與安全的維護之外，追求經濟發展幾乎已經成了每個國家的基本政策和目標。經濟重要性的愈受重視，與現今國際體系的互賴性增強，密切相關。經濟能力的強弱亦是國力強弱的重要指標之一，而且，經濟情況的好壞也與社會安定直接有關。

中國大陸自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並將實現「四個現代化」訂為國家政策目標，進入八〇年代，中國大陸領導人仍不斷強調改革與開放的政策不變，把追求經濟發展列為國家最高目標。

二、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對外政策的改變

一) 中蘇關係的惡化和中美關係的發展

中國大陸自五〇年代末與蘇聯交惡，六〇年代關係更進一步惡化，甚至爆發了激烈的軍事衝突。中國大陸感到安全深受威脅，因此逐漸向美國靠攏，而美國眼見中蘇關係惡化，認為有機可乘，也計劃聯中制蘇，於是七〇年代就形成了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半聯盟」(semi-aligned)型態，此時期中國大陸認為對其安全威脅的首要敵人已從美國轉而為蘇聯。³

二) 改革開放政策的提出

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中國大陸正面臨各種政治與經濟的問題。在經濟方面，

十年「文化大革命」招致的生產力停滯現象以及經濟退步現象，若不大幅度改變經濟政策，中國大陸必然出現嚴重的危機。在政治方面，文革派與鄧小平派之間的權力鬥爭日益激烈，可預見毛澤東死後的中國大陸的動亂狀況。⁴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於一九七五年一月在中國大陸「四屆人大會」上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構想，他說「遵照毛澤東指示，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⁵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所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政策上關鍵性的大會。鄧小平從此成爲名實相符的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並確立其實用主義路線。

該「三中全會」公報中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生產力，也就是必然的要求多方面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⁶這個公報談到經濟管理體制和其方法的改革，發展同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和設備，讓企業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⁷

從此以後，中國大陸爲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採取「政經分離」政策。所謂「政經分離」，通常指在東西冷戰體系下無邦交的不同意識形態國家之間互補性經濟往來的一種方式，也是一個雙方關係正常化的過渡性措施。⁸

第二節、中國大陸對韓國政策的基本目標及政策的演變

八〇年代中國大陸對外經濟工作已成爲「四個現代化」建設成功的關鍵。八〇年代中國大陸的核心任務已從政治意識形態鬥爭調整爲經濟建設，中國大陸的對韓半島政策亦隨之而變。

鄧小平在一九八八年九月曾對來訪的日本商界代表團說過：「與南朝鮮建立經濟關係是對中國推行現代化有利。」⁹這是中國大陸在經貿上對韓國的基本肯定，並表示八〇年代中國大陸對韓半島政策轉變的基本認知。

總而言之，中國大陸在不牽涉到政治的前提下與韓國進行經濟貿易來往，以獲取最大利益。

第三節、韓國對中國大陸政策的演變

一、韓國北方政策之推進

雖然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在實用主義下開放外交，假如沒有北方政策的推動，韓國和中國大陸之建立外交關係是很可能無法實現。一九八八年盧泰愚大總統宣布積極推動「北方政策」之後，韓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才出現極大發展。那麼，韓國北方政策是甚麼？北方政策給韓中關係有哪些影響？以下探討這些問題。

一）北方政策之概念

一九六九年初，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就任總統以後，尼克森總統發表亞洲新政策，其訊息為，美國軍事力量將逐漸由亞洲撤退，接著在外交上採取緩和政策，廣泛與共黨國家接觸，之後又訪問中國大陸等事件發生，使亞洲局勢為之震盪。¹⁰韓國政府為了適應一九七〇年代國際情勢的變化而於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發表「六二三和平統一外交政策宣言」。在「六二三宣言」之後，開始使用「北方政策」（Nord-politik）。其主要方向為逐步改善與蘇聯、中國大陸的關係，使得北韓放棄發動南侵而進一步幫助韓半島之安定和和平統一。

二）北方政策之目標和特徵

有關「北方政策」之目標，總體來說是韓國要透過中國大陸、蘇聯以及東歐關係改善，謀求南北韓和平共存體制而進一步達成統一的一個政策。¹¹北方政策的主要目標包括：¹²

- (1) 改善與共產黨國家的關係。
- (2) 減低北韓反對的敏感度。
- (3) 固守政經分離的原則。
- (4) 與美國合作均衡發展同北韓的關係。
- (5) 有系統地發展與北韓的經濟關係。
- (6) 加強外交官的訓練養成以展佈外交工作網。
- (7) 強化外交政策研究，設定中程目標，嘗試一切可能實現的方法。

北方政策的特徵為：¹³

- (1) 自主外交，依照國家利益而制定，適合國情，有益國際和平及國內民主的發展。
- (2) 全方位外交，範圍擴大，不受意識形態之拘束。
- (3) 採取互惠平等、友好、睦鄰的政策。

北方政策的具體方法為：先謀求在共黨國家設立貿易辦事處，下一步是將貿易辦事處發展為常駐代表處，最後是建立正式外交關係。¹⁴

三) 北方政策的展開

自韓國政府宣布「六二三宣言」以後，韓國即積極展開對共黨國家的笑臉外交攻勢，一直到八〇年代中期為止，在政治外交方面，由於蘇聯與中國大陸等仍堅持北韓才是韓半島上唯一合法政府的態度，一直沒有獲得肯定的結果。¹⁵

但是，盧泰愚大總統在一九八八年七月七日發表的所謂「七七宣言」是北方政策之一大轉折點。「七七宣言」之要旨如下：¹⁶

- (1)推動南北同胞積極互相交流以及讓海外同胞能自由出入南北韓自由來往門戶開放。
- (2)政府積極推進確認離散家族的生死、地址以及書信往來、互相訪問。
- (3)南北韓門戶開放以及互相貿易為民族內部的貿易。
- (4)不反對友邦國與北韓之間非軍事物資的貿易。
- (5)在於國際社會裡希望南北韓自由接觸以及合作。
- (6)有意協助北韓與韓國友邦的關係改善。

其最核心內容是不再把北韓視為競爭、敵對的對象，而視為民族共同體的一員，以這樣的基本內容認識為大前提推進與中國大陸、蘇聯及東歐諸國家的關係正常化而達成北方政策的最終目標。因此，「七七宣言」不但是北方政策之積極推動之結果，在實際上也是韓國與中國大陸建交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推動因素。

韓國北方政策新轉機的另一個背景是國際情勢的變化。一九八〇年代蘇聯政府推進國內改革政策，蘇美之間發展成政治和解和經濟合作的關係。此一氣氛促使東西陣營意識形態的障礙逐漸消失，東西陣營以國家安全為中心的政治轉為重視個別國家之間的貿易、投資、技術合作等，就是實行改革開放政策。

再者，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的成功，使全世界各國都肯定韓國之民主化以及繁榮。

首先是於一九八九年二月韓國與匈牙利發表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同年十一月與波蘭建交。¹⁷接著先後又與南斯拉夫、捷克、保加利亞、外蒙、羅馬尼亞、蘇聯以及阿爾吉利亞等國家正常化。到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韓國共與一百四十五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這是展現出韓國「北方政策」的成果。

第四節、韓國與中國大陸關係之發展

韓國與中國大陸關係，在進入八〇年代以後開始有了很大的轉變。對中國大陸來說，由於「四個現代化」的需要，決定與韓國展開經濟、文化、體育等非政治性交流。本節要分析韓國與中國大陸建交過程。

一、中國大陸民航機事件

在七〇年代末以後，國際情勢之改變、韓國北方政策以及中國大陸追求經濟建設影響了韓中兩國關係的變化，使得中國大陸與韓國開始貿易、人員交流等非政治性接觸。但是，雙方官方之間的接觸是始於幾次的中國大陸的「反共」人士

經由韓國投奔事件。首先，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六日中國大陸空軍少校吳榮根駕駛米格十九降落韓國。這是於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五日邵希彥與高佑宗駕駛 AU2 型輕運輸機經由韓國投奔自由到台灣以後，第一次中國大陸空軍經由韓國投奔事件。在此事件之前，正在進行北方政策而與中國大陸已有貿易關係的韓國，在處理此事件時，採取慎重態度，在吳榮根受調查期間的三天封鎖新聞。三天後發表新聞說明事件經過和駕駛員吳榮根「前往第三國」的意願。¹⁸到了二十二日才宣布吳的個人意願到中華民國，其駕駛飛機以國際慣例處理，即將交給中國大陸。這次事件在吳三十一日前往中華民國而結束。

然後，於一九八三年五月五日發生的「中國大陸民航機事件」使韓中兩國之間打開了直接談判的契機。卓長仁等六人脅迫一架自瀋陽飛往上海途中之中國大陸民航二六六號班機（英製三叉戟式 HS 一二一型噴射客機），迫降韓國漢城東北七十公里之春川美軍基地，機上共有乘客一〇五人（機組人員九名、日本乘客三名）¹⁹卓長仁等六人立即表示前往中華民國的意願。

六日，韓國政府發表處理此事件的原則，文化公報部發言人說：「韓國將以尊重海牙公約的精神，據以處理飛機、機員及旅客之方針」²⁰因此，韓國政府決定處理原則，整個事件由外交部主管，六名劫機者由國防部監管，審理問題由法務部主管，其原則的基礎為以「海牙公約」等國際慣例，將乘客、機員、機體送還中國大陸，對於六名有另外處理。²¹

七日，中國大陸派遣民航局長沈圖到漢城與韓方交涉人員與客機送還問題，造成韓中兩國之間首次官方接觸。

不透過第三國的韓國與中國大陸之間「出乎一般的預料」的直接談判，五月十日結束，雙方在接受對方正式國號作成「簽署備忘錄」，解決了「意外災難性

的事件」，並且在九條的「備忘錄」當中規定「約定將來發生涉及類似緊急情況，將本著處理這次事件的充分合作精神來進行合作」，以「開創了無邦交國家之間處理共同關心事務的先例」。²²

從此次事件以後，韓國與中國大陸兩國之間發展經貿、體育交流等各方面的關係。在一九八四年，韓國方面藉以國際會議、體育交流、經貿活動、「離散家族」的探親等目的訪問中國大陸者已有 77 人；中國大陸方面許可 29 名人員的訪韓，以及 228 名韓僑的訪韓等。²³

二、魚雷艇事件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國大陸海軍北海艦隊所屬的魚雷快艇編號三二一二號兩名軍人發難，槍殺六個人，擊傷兩個人之後，控制其餘艇員九個人返航開向台灣，因燃料用盡再海上漂流九個小時後，被韓國漁船發現，最後二十二日由韓國軍艦拖到漢城南方兩百多公里的群山港。隨後二十三日凌晨，中國大陸軍艦三艘進入韓國海域搜索，被韓國海空軍驅退。²⁴因此，韓國對此「侵領海事件」，向中國大陸提出「嚴重抗議」，並要求「道歉」。對此，中國大陸承認軍艦入侵韓國領海，但同時要求韓國釋放魚雷艇和人員。²⁵

次日（二十四日），韓國文化公報部長李元洪發表「魚雷艇事件」，說經過調查並無任何政治動機，打鬥的原因是單純的個人事件，因杜新力、王中榮受到上級責罵一時衝動開槍射擊，造成六死兩傷。以此理由，韓國政府決定將中國大陸的快艇及全部人員交還給中國大陸。²⁶

中國大陸為了解決這次魚雷艇事件，再次透過駐香港「新華社」和駐香港韓

國總領事館開始談判。於是二十六日中國大陸「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授權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名義向韓國道歉，中國大陸以英文和中文作成備忘錄，對於侵犯「水域」一事「道歉」，並對韓國政府（貴方）決定早歸還人與艇，中國大陸表示「感謝」。在備忘錄之中沒有使用「貴國」和「領海」，只用「貴方」和「水域」的詞彙，以迴避承認韓國為主權國的政治效果。但是，中國大陸還是接受韓國的要求，對於侵犯「水域」表示「道歉、懲罰及感謝」，以實際上肯定了韓國領土主權。²⁷

二十八日，韓國把人和快艇交還給中國大陸，於此正式結束此事件。²⁸

自本案發生後，在中華民國方面發表嚴重地不滿聲明，使韓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越惡化，但是，在韓中關係之間就從此開拓了政治關係。²⁹

三、漢城亞運和漢城奧運

第十屆亞洲運動會於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日起十六天在韓國首都漢城舉行。中國大陸派於一百十四名的亞運代表團到無邦交的韓國，中國大陸對韓半島的新政策已有了明顯取向。³⁰

在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前一年的一九八七年，在八〇年代末宣布「北方政策」之韓國政府對內外強烈宣傳，奧運為韓國北方政策的轉折點，透過各種渠道進行中國大陸和蘇聯以及東歐「北方國家」的交涉。加上，中國大陸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等的改革開放政策而對於韓國採取了發展關係的政策。所以，中國大陸對韓國表示參加奧運之外，一直強調韓中兩國之間的經貿關係的發展。³¹然而，中國大陸還是不願意失去其安全上極重要的北韓的傳統友誼，也不希望蘇聯在³²

北韓和韓國爲所欲爲，所以，中國大陸對於南北韓關係上採取不同發展關係的政策。當時中國大陸總理李鵬對於韓半島政策的方向說：

『中國大陸決定參加奧運會，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爲中國是國際奧運會的正式成員，中國參加奧運會是按奧運會章程行事。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其次，這是一次體育盛會，中國的體育界和廣大體育愛好者願意看到中國的體育健兒參加這次盛會，通過這此大會，可以交流技術、提高體育運動水平，加強運動員之間的友誼。——中國在處理朝鮮半島的問題時是從希望朝鮮半島能保持緩和與穩定這個大局出發的。中國和南朝鮮沒有外交關係。中國也不準備同南朝鮮建立外交關係。——同中國與其他一些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和地區一樣，中國和南朝鮮之間有貿易往來，但是非官方的，是民間的渠道來進行的。』³³

在漢城亞運和漢城奧運之後，韓國和中國大陸的關係頗有進展。從此，中國大陸對韓國擴展了經貿關係。一九八五年以來的雙方貿易額僅佔各方全體貿易的 2% 左右，而且，彼此依賴程度上低。³⁴但是，一九八六年爲 12 億美元、一九八七年爲 16 億美元。一九八八年雙方之間進行有關辦事處問題的協議之後，雙方的貿易從香港、第三國の間接形式改爲直接輸送、直接商談的形式。而且，同年十一月「中國銀行」和韓國的「外換銀行」之間締結外換契約等的雙方貿易條件的改善之下，貿易總額增加爲約 30 億美元。一九八九年爲 31 億美元，一九九〇年爲 38 億美元等，到了一九九〇年中國大陸已成爲韓國的第四大夥伴，韓國已排名爲中國大陸的十大貿易國之一。³⁵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韓中締結「貿易協定」之後，韓中雙方更擴大經濟交流。

在韓國對中國大陸投資方面，從一九八五年以透過第三國當地公社の間接投資形式開始改爲一九八八年末以來直接投資開始以後急增，在一九九〇年韓國對中國大陸投資已達 260 件 2 億 1 千萬美元的規模。³⁶

四、韓國和中國大陸之建交

韓中關係正常化雖因中間有中國大陸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而使韓中雙方關係受到了曲折，但是，韓中兩國關係還是繼續往前發展。一九九〇年，在韓國和蘇聯關係正常化和國際緊張情勢緩和的背景之下，韓國與中國大陸在同年達成協議設置具有領事能力的貿易辦事處。此外，一九九一年，南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後，有助於加速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上述背景加上下面一些因素的考量，終於導致中國大陸改變只承認北韓的韓半島基本政策：第一，中國大陸判斷，由於東北亞局勢的變化，已不再繼續延遲兩國建交，而且，與韓國建交反而會促進北韓與日本及美國改變關係。第二，中國大陸可能認為，韓國和中國大陸建交對於拒絕成為國際社會一員的北韓可成為一個警惕，並且，有助於解決韓半島問題。為使北韓對其與日、美改善關係之前提的南北韓互相核武檢查採取讓步，中國大陸很可能決定盡早與韓國建交。第三，一九九一年七月，非洲的尼日共和國不顧與中國大陸斷交的代價而與中華民國建交，給予中國大陸相當大的衝擊。中國大陸可能因此決定了要與韓國建交以彌補其外交上的失敗。第四，是出於經濟上的理念，鄧小平南巡以後，中國大陸為促進改革和開放，感到了與韓國進行經濟合作的重要性。³⁷通過幾次的會談之後，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韓國與中國大陸政治建交。韓國北方政策，加上，中國大陸領導人鄧小平追求經濟建設，有利地推動了韓國與中國大陸之建交。

-
- ¹ 畢英賢主編，《蘇聯》，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一九八九年，業 340~343。
- ² 畢英賢主編，《蘇聯》，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一九八九年，業 343~344。
- ³ Harry Harding, "China's Changing Rol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ed. By Harry Hard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90.
- ⁴ Henry A.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3rd ed. (N. 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7), p35~38.
- ⁵ 人民日報，「所謂四個現代」，北京：人民日報，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四日。
- ⁶ 張敬文，「匪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分析 — 一場鬥爭的結果」共黨問題研究，第五卷，第八期（台北：共黨問題研究中心，民國七十年八月），頁 25。
- ⁷ 白萬祥，「論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中國大陸黨前面臨的問題及其動向，台北：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民國七十五年三月，頁 169。
- ⁸ 李相俊，「共產圈交易 — 其本質與展望」，漢城：每日經濟新聞社，一九八八年，頁 42。
- ⁹ 金祐亨，《中共對韓半島政策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一九九一，頁 86。
- ¹⁰ 陳淑珠，「韓國北方政策與中韓關係」，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民國八一年十一月。
- ¹¹ 金國振，「北方政策的現況與展望」，漢城：韓國外交政協會，一九八九年，頁七十九。
- ¹² 金國振，「北方政策的現況與展望」，漢城：韓國外交政協會，一九八九年，頁三~四。
- ¹³ 金國振，「北方政策的現況與展望」，漢城：韓國外交政協會，一九八九年，頁二十七~二十八。
- ¹⁴ 劉青雷，「韓國的北進外交政策」，問題與研究，第 29 卷，第 8 期，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一九九〇年，頁 30。
- ¹⁵ 朱松柏，「韓國與中國大陸關係的檢討與展望」，問題與研究，第二十三卷，第十一期，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一九八四年八月，頁 40。
- ¹⁶ 張智惠，《韓國與中國大陸建交過程之分析：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二年》，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六年元月，頁 27。
- ¹⁷ 漢城：朝鮮日報，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日。
- ¹⁸ 台北：中央日報，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 ¹⁹ 趙國才，「從卓長仁等投誠案例論國際法上隻奪雞逃亡」，問題與研究，第二十九卷第七期，一九九〇年四月。
- ²⁰ 漢城：東亞日報，一九八三年五月八日。
- ²¹ 海牙公約之主要內容，參見「六義士奪機投奔自由」，國際現勢週刊，第 1419 期，台北：國際現勢週刊社，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六日，頁 6。
海牙公約精神之主要內容有兩點：(1) 奪基者必須遣送回國，如不遣送回國則必須依法審判處罰。(2) 飛機與乘客必須送回原國家，但奪機者如係出於政治動機，則須依國際慣例來處理。
- ²² 沈圖，「漢城談判紀實」，北京：文匯報，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三日。

-
- ²³ 外交部，「韓國外交 40 年：1948~1988」，漢城：外交部，一九九〇年六月，頁 210。
- ²⁴ 「中國大陸快艇血奔自由南韓偽稱無政治性」，國際現勢週刊，第 1517 期，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頁 3。
- ²⁵ 北京：人民日報，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 ²⁶ 漢城：漢城日報，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 ²⁷ 米榮順，《中國大陸對韓政策及其對中韓關係之影響（1980-1987）》，台北：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論文，一九九〇年六月，頁 184~185。
- ²⁸ 裴瑞蓮，「從軍事觀點看中國大陸魚雷快艇的悲劇事件」，中國大陸，第 18 卷，第 212 期，台北：中國大陸研究所，一九八五年四月，頁 13。
- ²⁹ 李相禹，「韓國在中國大陸快艇事件中的得失」，星期論壇，漢城：星期論壇社，一九九六年四月，頁 4。
- ³⁰ 香港：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十月四日。
- ³¹ 香港：明報，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八日。
- ³² 香港：明報，一九八八年三月十六日。
- ³³ 北京：日報，一九八八年七月四日。
- ³⁴ 康峻榮，「韓國與中國大陸經濟交流的發展」，漢城：東亞季刊，第二十二卷第二期，頁 71。
- ³⁵ 大韓貿易振興公社，「海外市場國別 SERIES (94) 中國 (CHINA)」，漢城：KOTRA，一九九〇年六月，頁 70。
- ³⁶ 漢城：日報，一九九二年二月三日。
- ³⁷ 禹鍾溟，《韓國北方政策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一九九三年七月，頁 137~138。